读史札记

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考略

汤开建

关于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统计，中西文献均有记录，但所录数据歧异甚大，令人莫衷一是，很多研究者对于各种数据亦未加考辨，即取其中一数为其论述之根据，固所得结论不可信。因此，如不将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数据考订确实，对于整个天主教在清朝前期的发展是无法讲清楚的。

据目前所见资料，关于顺治朝全国各地教堂教友统计数者有四种文献：一是由方豪先生收藏的《辩学》手抄本，之后附《各处堂志》，录全国各地教堂 35 处，无教友数①。据方豪言，该抄本言康熙时期，而我判断应是顺治末之情形；二是杨光先《不得已》卷上《请诛邪教状》和《与许青屿侍御书》，录全国教堂 30 处，无教友数，上文作于康熙三年（1664）②；三是当时的葡籍神父伽马（Louis de Gama，又译作甘类思）完成的《1663 年中国教务统计表》，录全国教堂 32 处，教友 111600③；四是近人徐宗泽神父根据当时教会资料完成的《1664 年全国教务情形》，录全国教堂有数据者 156 处，无数据者 17 处，教友 114200 人。④其中以徐氏统计最为详细，故亦成为许多研究者的主要引录数据，但也有不少研究者引用伽马的数据，因为他的资料更具原始性。但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而言，可以肯定，上述四种来自于教会或者反教会的资料均不是当时全国各地教堂、教友的详细统计数，有的是对全国天主教的一个大概数，如《不得已》；有的是以当时作者个人所了解到的全国教堂数，如《辩学·各处堂志》；有的是取天主教中国副省耶稣会在全国主要城市的大教堂数和教友登录，如伽马表；有的则是根据多种教会报告零散汇总而成，并没有进行过全国性的普遍调查。因此，都存在着严重的脱漏，完全不能作为顺治朝时期天主教教堂教友发展的准确数据，但可以相信上述四种文献均为第一手资料，统计之总数虽不确，但所录之各地教堂、教友又是一可参考之系数。因此，要得出一个较为可信的数据来，势必汇总四种文献，再参照目前尚能补充的资料对全国各地的教堂教友数进行一次考订，以求获得一批较为可信的数据，并厘清各种文献互异的矛盾。但是由于所见及所存西文资料有限，这种考订只能是对已有的资料作一次系统的清理，缺漏仍不可免。

一、直隶省：**1664** 年有教堂 **35** 所，教友 **19153** 人（均为有明确数据者，下同）

1. 北京：《各处堂志》列北京教堂 1 处，《不得已·与许青屿侍御书》、伽马表及徐表均列教堂 3 处。一为南堂，始建于 1610 年，顺治十四年（1657）重建，“在宣武门之内”；一为东堂，1655 年建，在“东华门之东”；一为滕公栅栏墓地教堂，在“阜城门之西”，1660 年建。但这只是北京城内的教堂，据费赖之书《利类思传》：“（1665 年后）类思偶一赴城外传教，当时近畿有大堂 7 所，小堂 14 所”。⑤

因此，可知北京城内外共有教堂数为 24

[收稿日期] 2001 - 5 - 15
[作者简介] 汤开建（1950 - ），男，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广州 510632

所。徐表又列北京教徒 1664 年时为 15000，伽马表列 1663 年时为 13000，费书《安文思传》："1663 年京师受洗 500 人，近畿受洗者千人，次年 700 人"[⑥]。知 1663 - 1664 年间，北京受洗人数为 2200 人。伽马表为 1663 年前人数，则当为 15200 人，与徐表大致相合。

2. 正定：徐表列正定教堂数为 7 所，而教友数无。《不得已》、《各处堂志》及伽马表无正定之名。费书《安文思传》："（1648 - 1655 年间）当时正定府有教堂 7 所"[⑦]。与徐表同。费书《汪儒望传》："（1656 年）儒望赴正定劝化 763 人入教，六年后复至正定，见教民信心仍笃，入教者增加 490 人，次年增加 700 人"[⑧]。则 1664 年前正定之教友至少有 1953 人，可补徐表之缺。

3. 保定：徐表列保定教堂 2 所，教友数无。《不得已》、《各处堂志》及伽马表无保定之名。费书《安文思传》称 1648 - 1655 年间保定府教堂 2 所[⑨]。与徐表同。

4. 河间：《不得已》及《各处堂志》无河间名。徐表列河间教堂 1 所，伽马表列河北教堂 1 所，均列教友数为 2000 人。费书《安文思传》同。[⑩]

5. 其他地方：费书《安文思传》称 1648 - 1655 年间直隶省教堂"山中一所，此外诸城中有驻所 14 处，数处各有教堂 1 所，其他村镇未计焉。"[⑪]

二、山东省：1664 年时有教堂 14 所，教友 3000 人

1. 济南：徐表中未列济南教堂明确数，仅称山东全省 10 所。《不得已》及伽马表列 1663 年济南教堂 1 所，《辩学 ·各处堂志》称济南有两堂，一在西门，一在布政司东圣人会堂。费书《汪儒望传》："1660 年儒望被派至济南管理教务 ……当时新增 ……礼拜堂 10 所。"[⑫]可知，1660 年仅济南一地耶稣会就增建教堂 10 所。济南在明末时龙华民即已开教当地，当有旧堂。费书《李方西传》：1653 年方西在济南建教堂 1 所。[⑬]徐表及伽马表均列济南有教友 3000 人。费书《汪儒望传》称：从 1660 年起，济南"教务日见发达，每年入教者约 500 人"[⑭]。从 1660 年到 1664 年则济南的实际人数是 2500 人左右。3000 人是全省人数，故还有 500 人当属下所言及之济宁与泰安。

2. 济宁：诸书均未言及济宁一地，而《辩学 ·各处堂志》称济宁教堂在"西门外乡下数里地方"，可知济宁有一堂。

3. 泰安：诸书均未提及泰安。费书《汪儒望传》："（1660 年后）又由济南传教临近地区，远至直隶边境。当时新增 ……泰安教堂一所"[⑮]。教友人数不详。

三、山西省：1664 年时有教堂 6 所，教友 6328 人

据费书《金弥格传》："（1630 年后）赴山西传教三十五年，当时山西有教堂三十余所，而经弥格建设者二十有三"[⑯]。而据黄一农先生统计，崇祯十三年（1640）时山西有大小教堂 102 座[⑰]。后因明末清初之乱，大部分教堂被毁。但到顺治中后期，各地教堂相继修复，其有据可查者为：

1. 绛州：《不得已》及《各处堂志》均列绛州堂，徐表未列绛州教堂数，但列教友数 3300；伽马表列绛州教堂 1，教友数 5000。明末绛州是山西天主教发展最活跃地区，崇祯四年（1631）左右，有各式教堂 30 座[⑱]，但"明末清初之乱，官吏中有仇教者毁绛州教堂"[⑲]。1646 年时，"朝廷向各地总督下令赔偿全部损失，并为购置一所更好的房屋"作教堂[⑳]。康熙四年清档："恩里格供称，我于顺治十六年独自从西洋来香山澳，康熙元年（1662）来至山西，与金弥格同住于绛州旧堂"[㉑]。可知，到 1664 年时，绛州地区至少还有两座教堂，教友数当为 5000 人。

2. 蒲州：《不得已》及《各处堂志》无蒲州名，徐表未列蒲州教堂数，列教友数为 300 人；伽马表列蒲州教堂 1，教友 300 人。蒲州明末时已开教，1634 年时绛州和蒲州受洗者达 1530 人。高一志曾在蒲州建教堂[㉒]，1638 年万密克又在蒲州建一新堂。1643 年蒲州教堂似毁于火。有一说称万氏 1645 年时，重建蒲州教堂。[㉓]

3. 太原：《各处堂志》、徐表及伽马表均未列太原名，《不得已》有太原堂。费书《金弥格传》："（1625）开教于太原 ……十二日间受洗不下 200 人"[㉔]。同书《恩理格传》：1662

年，“其人（山西省长官）为理格重修教堂及住宅，为介士人不少入教，不仅太原如是，静乐亦如是，1664 年理格居此城一月，得受洗者 828 人。”[25]可知，太原有教堂 1 所，教友约 1028 人。

4. 静乐：诸书表均未言静乐教堂，见太原条所引资料，知静乐当时亦有教堂 1 所。

5. 平阳：诸书均无平阳名。费书《恩理格传》：“1662 年乃派理格到山西，（平阳总兵官）曾为理格在府城中建筑新教堂 1 所。”[26]

四、陕西省：1664 年时有教堂 82 所，教友 60130 人

1. 西安：《不得已》及《各处堂志》均列西安堂，徐表列圣堂城内 1 所，城外 9 所，教友 2 万人。伽马表列圣堂 2，教友为 2 万人。西安教堂始建于 1629 年，在王征的协助下即建了一大一小两座教堂。[27]1630 年傅泛际在西安建堂一所。[28]1635 年时方德望神甫到西安又建筑教堂。1647 年受洗 460 人，1652 年受洗 2699 人。[29]费书《李方西传》：“（1659 - 1663 年间）西安府有教堂 2 所，诸属县有教堂 8 所，诸村镇有教堂 50 所，小堂无数。”又称：“是时（1659）陕西省有教民 12000 人，1663 年增至 2 万。”[30]教友人数相合，但教堂则歧异甚大，实际上西安府有据可考之教堂为 60 所，还不包括“小堂”之数。

2. 汉中：《不得已》无汉中名，《各处堂志》列汉中堂，徐表列圣堂城内 1，城外 5，会口 15，教友为 40000 人；伽马表列圣堂 1，教友 40000 人。汉中开教始于 1635 年。当时即建有教堂。费书《利类思传》：“1647 年抵汉中……彼等留汉中约两月，方德望神甫等赖其力，教堂及教众未受兵祸”[31]。费书《穆格我传》：“1657 年初抵中国，初派至陕西，管理汉中、城固等地教务”[32]。

3. 城固：城固属汉中府，费书《穆格我传》：“1664 年，教民在小寨共建广大美丽教堂一所”[33]。小寨又属城固。

4. 三水、宜君两县：三水属豳州，宜君属豳州。费书《李方西传》称，两地 1663 年时有 130 人受洗[34]。两地距西安 400 里，当有教堂 1 所。

五、甘肃省：1664 年有教堂 1 所，教友 300 人

甘州：徐表及伽马表无甘州名，费书《李方西传》称 1663 年前甘州有 300 人入教[35]。远在甘州的教徒不可能远至西安作礼拜，则甘州当有教堂 1 所。

六、河南省：1664 年有教堂 1 所

开封：伽马表无开封，《辩学》之《各处堂志》亦无开封。杨光先《不得已》称开封有 1 堂。徐表亦列圣堂 1，并称 1664 年开堂，无教友数。费书《费乐德传》：1630 年左右，费乐德在开封建圣堂一座，当时教友数千人。[36]“李闯之乱”，开封教务尽毁。1664 年恩理格到开封“兴复教堂”，且“入教之人甚众”[37]。但无具体教友数。

七、四川省：1664 年共有教堂 4 所，教友 600 人

1. 成都：伽马表列成都教堂 1，教友 300；徐表无成都教堂数，并称四川教友 300。成都教堂始建于 1640 年，张献忠入川时，教堂已毁，后献忠重用利类思、安文思二神甫，又另建一新教堂[38]，时 1644 年。清兵入川时，未闻成都堂毁。但杨光先《不得已》及《各处堂志》均未提成都堂。方豪据教史材料，1662 年，“西士穆格我始入川，成都、保宁、重庆，次第开教，施洗 600 余人”[39]。则是成都堂在清兵入川时又毁，而至 1661 年重建，故称成都教会获徐甘第大资助。

2. 重庆：徐表无重庆教堂数，伽马表无重庆之名，《各处堂志》亦无重庆，但杨光先《不得已》有重庆堂。费书《穆格我传》：“格我于 1662 年离汉中赴重庆缵曾馆之官署，并给一适当处所为教堂”[40]。故知重庆于 1662 年重新开教，建堂一所。前面称成都、重庆、保宁三地受洗 600 人，又有资料称成都 300 人，则其余 300 人当是重庆与保宁之教友数。

3. 保宁：伽马表与徐表及《各处堂志》均无保宁名，《不得已》载保宁堂。《穆格我传》：“（1662）已而，赴保宁府开辟一新教区”[41]。知保宁亦在 1662 年重新建堂。

4. 南江：伽马表与徐表及《不得已》、《各处堂志》均未有南江。前引《穆格我传》：“1664 年格我再入川，曾在南江建筑教堂 1 所”[42]。南江堂建于 1664 年，故诸书均未收，

南江属保宁府，教友人数不详。

八、湖广省：1664 年时有教堂 8 所，教友 2200 人

1. 武昌：《不得已》、《各处堂志》均提及武昌堂，并称在汉阳门。伽马表无武昌堂数，但称武昌教友 1000 人。而徐表则称武昌堂 8，教友 2200 人。武昌建堂始于何大化来华后，但清兵南下时被毁，据费书《何大化传》："1660 年始修复"[43]。又据费书《穆迪我传》，1661 年时，迪我至武昌，"许夫人为购房屋一所，并建教堂一处……越四年，有教民 2200 人"[44]。教友人数与徐表同，但目前所见资料武昌 1664 年前仅 2 所教堂，余 6 所当在汉口或湖广其他城中的会口。

九、江西省：1664 年有教堂 6 所，教友 5400 人

1. 南昌：《不得已》有南昌堂，《各处堂志》称南昌堂"在棉花市戊子牌坊杏花村"。伽马表称南昌堂 1，教友 2000，徐表称"圣堂城内 1，城外 2，教友 1000。"南昌堂始建于 16 世纪末，清军入江西时，南昌教堂毁于战火。费书《穆迪我传》："1657 年初抵中国，派往江西。迪我到南昌，教堂驻所皆渐倾圮，迪我得许缵曾助，悉皆修复，并于 1660 年扩而张之"[45]。以此观之，南昌堂当不止一座，徐表似是。

2. 建昌：《不得已》无建昌堂，《各处堂志》称建昌堂"在府前黄家岭"。伽马表称建昌堂 1，教友 200；徐表列建昌堂 1，教友 500。建昌建堂始于 1630 年，为费奇规神父建[46]。清兵入江西时，建昌教堂毁于战乱。费书《刘迪我传》："1659 年，迪我赖佟巡抚之助，修葺建昌教堂住宅"[47]。同书《殷铎泽传》则称："1660 年在建昌府建筑住宅一所，并将教堂修复，两年间受洗者 2000 人，建昌以外诸城镇传教所经主持者尚有 7 处"[48]。教堂数同，但教友大大高于诸书所载，至 1662 年时建昌教友至少有 2000 人。

3. 赣州：《不得已》有赣州堂，《各处堂志》称堂"在西门内道衙门东"。伽马表无赣州名，徐表称赣州堂 1，教友 2200 人。赣州开教始于何时不确。费书《刘迪我传》："既至赣州，（佟）国器为建教堂一所，又为购置宽大驻所一处，1658 年教堂落成"[49]。知赣州教堂建于 1658 年。

4. 吉安：《不得已》及伽马表均无吉安名，《各处堂志》称吉安堂"在东门内横街"。徐表无吉安教堂数，教友 200 人。吉安开教时间不确，费书《刘迪我传》："1662 年在吉安建筑教堂一所"[50]。同书《聂仲迁传》："（1664）仲迁赴吉安，时吉安有教堂一所，小驻所一处"[51]。

十、福建省：1664 年时有教堂 27 所，教友 7090 人

1. 福州：《不得已》有福州堂，《各处堂志》称福州堂"在南门内宫巷"。伽马表列福州圣堂 2，教友 2000；徐表列福州堂数为 13，但包括兴化、连江、长乐等处，共有圣堂 5，会口 8，教友 2000。福州开教始于 1625 年，不久在福州建教堂，1638 年福州教堂被没收，后又恢复。即费书《艾儒略传》："数年以后在各府建教堂八所"[52]。亦崇祯十四年（1641）建宁县正堂告示称："八闽郡邑，咸建教堂"[53]。清兵入闽，福建各地抗清战争不止，清政府实行"迁海"政策，"以滨海之地，教友素多，漳、泉所居，教堂林立，此令一行则堂皆被毁"[54]。福州之教堂当毁于此际。费书《何大化传》："大化被派至福建，管理福州八堂……事平之后，大化鼓励教众修复教堂，1656 年省会中有教徒 2000 人"[55]。可知福州旧有 8 座教堂，到 1656 年时，均已修复。又同上传，1647 年"大化赴连江县，其地被劝化者凡九十人，并在附近 Ki - Ken 及 Ngan - hang 两地各建教堂一所"[56]。福州 8 所加 Ki - Ken 及 Ngan - hang 两地的教堂，再加连江（连江堂为何大化建在 1647 年，见上文）、长乐（《何大化传》1664 年长乐有大教堂一所[57]）、兴化（费书《聂伯多传》称兴化建教堂在 1635 年[58]）三地各一堂，则正好 13 座教堂，教友 2000 人，与徐宗泽所据资料相合。

2. 延平：《不得已》有延平堂，《各处堂志》称延平堂"在大东门口"，伽马表列延平堂 1，教友 300；徐表无延平堂数，列教友 3600 人。费书《郭纳爵传》："（1644）延平有教堂三：天主堂一、圣母堂一、天使堂一"[59]。到 1664 年时延平有 3 座教堂，教友 3600。

3. 建宁：《不得已》有建宁堂，《各处堂志》称建宁堂“在北门内”。伽马表无建宁堂数，列教友数 200，徐表同。建宁堂建于明末，清兵入闽时毁，何大化入闽又修复。据前引《郭纳爵传》，1664 年时建宁府有大教堂一，建宁县（当为建安之误）亦有大教堂一[60]。则建宁有两座教堂。建宁由瓯宁和建安两城合并，当是瓯宁和建安各一所，建宁教堂隶属延平。

4. 邵武：《不得已》无邵武名，《各处堂志》称邵武堂“在东门内檀香寺对门”。伽马表无邵武堂数，列教友 400，徐表同。据前引《郭纳爵传》，邵武有大教堂一所[61]，隶属延平。

5. 清流：诸书表均无清流教堂。上引《郭纳爵传》清流有大教堂一[62]，隶属延平。

6. Wei - Chan：疑为永春，诸书表均无永春教堂，上引《郭纳爵传》永春有大教堂一[63]，隶属延平。

7. 沙县：诸书表均无沙县教堂，上引《郭纳爵传》沙县有大教堂一所[64]，隶属延平。

8. 汀州：《不得已》有汀州堂，《各处堂志》无。伽马表列汀州堂 1，教友 400，徐表未列汀州堂数，列教友 800 人。费书《刘迪我传》：“1659 年……并在距赣州十月程之福建汀州建筑教堂一所，次年，又在其地建筑圣母堂一所”[65]则汀州 1664 年前有教堂 2 所，教友 800 人。

9. 彝山、崇安：彝山（当即武夷山）。诸书表均无彝山、崇安名，徐表称“彝山、崇安县等处圣堂多所”。费书《艾儒略传》：“武夷山有庙宇 3 所，儒略改其 2 所为教堂”[66]时在 1647 年，崇安在武夷山麓，艾儒略在山中改建之教堂可能到顺治末尚保存。1664 年时崇安与武夷山之教堂为 2 所，教友数不详。

10. 浦城：《各处堂志》载有浦城教堂，其余书表均无浦城名，浦城当有教堂 1，教友数不详。

十一、浙江省：1664 年有教堂 6 所，教友 1000 人

1. 杭州：《不得已》有杭州堂，《各处堂志》称杭州堂“在北门内天水桥南”。伽马表列杭州堂一，教友数 1000；徐表列堂 2，教友 1000。杭州教堂始建于 1616 年，第二座教堂建于 1623 - 1625 年间[67]。清兵入浙时，杭州教堂赖卫匡国之庇佑而未遭兵祸，故一直保存。费书《卫匡国传》：“1658 年至杭州，得浙江巡抚佟国器之助，建筑新堂，修理旧堂，诸堂为之焕然一新”[68]。《辩学》亦称：“顺治十五年（1658）……比来杭……天主堂逼近行伍……卫（匡国）复建于天水桥之南，造作制度，一如大西。规模宏敞，美奂美仑”[69]。有人认为卫匡国所建之堂即杨廷筠捐建的第一座教堂，[70]但西文资料均称是建筑一座新教堂，而非旧教堂的改建。该堂 1659 年动工，1660 年举行开堂礼，当时受洗 207 人，被称为“为中国全国最美丽之教堂”[71]。又费书《洪度贞传》：“卫匡国神甫建筑之教堂在度贞任内落成……（又）在杭州附城郭建筑教堂一所”[72]。如是，至 1664 年前，杭州有旧堂 2 座，新堂 2 座。

2. 金华：伽马表与徐表无金华之名。《不得已》有金华堂，《各处堂志》亦有金华堂。金华当有教堂 1 所，教友数不详。

3. 嘉兴：伽马表、徐表及《不得已》均无嘉兴之名，《各处堂志》称嘉兴堂“在西门府学后”。则嘉兴有教堂 1 所，教友数不详。

4. 兰溪：伽马表、徐表及《不得已》均无兰溪名，《各处堂志》称兰溪堂“在张家马头进小巷”。费书《卫匡国传》：“1646 年，在兰溪建新教堂一所”[73]。兰溪有教堂 1 所，教友不详。

5. 湖州：伽马表、徐表及《不得已》均无湖州名，《各处堂志》有湖州堂。湖州当有教堂 1 所，教友数不详。

十二、江南省：1664 年有教堂 107，教友 61799 人

1. 南京（江宁）：《不得已》有江宁堂，《各处堂志》称江宁堂“在旱西门内螺丝转弯儿”。伽马表列南京堂 2，教友 600；徐表列南京堂 1，教友 600。南京建堂始于 1610 年，1616 年教案后被拆毁。1634 年时，毕方济在南京授洗 600 人，1641 年在南京城内建天使堂[74]。1658 年荷使进京途经南京时曾见此大教堂[75]。又据费书《史惟贞传》，1619 至 1620 年间，还曾在南京城中设一礼拜堂。[76]清兵南下，

南京未遭兵祸，旧堂应保存。同书《张玛诺传》："旋至南京，1660年教民集资建筑教堂一所"[77]。同书《刘迪我传》："(1664) 南京旧有教堂，佟巡抚嫌其小，拟建大堂一所，未果行，然迪我已得教民巨资，建筑大堂一所……城外亦有教堂一"[78]。同书《柏应理传》："1663年时主持南京教务，时南京有信徒六百人。1664年……为四百四十人授洗"[79]。总计南京城内外有教堂4所，至1664年时有教友1040人。

2. 扬州：《不得已》有扬州堂，《各处堂志》称扬州堂"在钞关门内过打珠巷木贡子上琼花宫对过"。伽马表列扬州堂1，教友800；徐表列扬州堂1，教友1000。扬州开教在1615-1616年间，由艾儒略开教，1664年毕方济又至扬州传教，但未见教堂之记录[80]。费书《毕嘉传》："1660年在扬州建筑教堂和住宅各一所。1664年扬州计有会团5所"[81]。知扬州有教堂1所（建于1660），教友当作1000。

3. 镇江：《不得已》有镇江堂，《各处堂志》称镇江堂"在南门内大街上第三座牌坊下"。伽马表列镇江堂1，教友1000人；徐表无镇江堂数，列教友200。镇江开教当亦在明末，但未见建教堂。费书《毕嘉传》："1663年……在镇江建筑教堂和住宅一所"[82]。知镇江堂建于1663年，教友1000人。

4. 淮安：《不得已》有淮安堂，《各处堂志》称淮安堂"在北门内台山寺东"。伽马表列淮安堂1，教友600；徐表列堂1，教友800人。淮安开教始于1638年，授洗110人[83]。但淮安堂始建于何时不确。《汤若望传》第一册页257载："淮安县教堂在传教士毕方济去世时，竟被军队占据"[84]。"张玛诺1662年管理淮安教务，教民遂参加瞻礼祈祷如故"[85]。可知，淮安确有教堂，教友800人。

5. 上海：《不得已》有上海堂，《各处堂志》称上海堂在"县后马窑衖"。伽马表列上海堂2，教友40000人；徐表称"圣堂有城内老天主堂及南门九间楼，乡下66"。1608年徐光启请郭居静到上海开教，首建一小堂于南门九间楼[86]。1641年潘国光收购仁安里潘氏旧宅建一新堂名"敬一堂"[87]。当时仅1639-1640两年受洗人数达2364人[88]。又据荣振华记载，潘国光1647年到上海后，"每年为2000-4000人举行洗礼"[89]。反映顺治初期上海天主教发展迅速。清军南下，获上海知县保护，上海教堂未毁[90]。故到1664年时城内仍为天主堂2。徐表称上海附近乡中有教堂66处。据卫匡国的资料：17世纪60-70年代上海约有40-70座教堂[91]，与徐表堂数大致相合。伽马表称上海教友40000，徐表称42000，又一说50000。据巴笃里《中国耶稣会史》及柏应理《一位中国奉教太太》的资料，1665年松江教友为50000余人[92]。上海属松江府，故上海教友当以40000或42000为宜。

6. 松江：《不得已》无松江之名，《各处堂志》称松江堂"在娄县东丘家湾"。伽马表列堂1，教友2000；徐表无松江堂数，教友2000。松江开教始于1627年，教堂始建于1658年。由于许甘第大的帮助，潘国光兴建。据高华士博士提供的资料，松江地区1665年已发展到92座教堂，这与1665年以后不久的一幅清初中国地图所标松江地区100座教堂之数非常接近[93]。但与之冲突较大的是上引巴笃里与柏应理资料，均称1665年时"松江一府共有教堂66所"[94]，荣振华则称1665年时松江有"70个教堂和5万名基督教徒了"[95]。是否可将巴笃里和柏应理及荣振华的数据均理解为上海城乡的数据。如是，因上海属于松江，除去上海城乡的68座教堂，松江府城及其他城乡还有二十余座教堂，柏应理1680年的材料：松江城内有圣堂1座，城外有圣母堂1座，附近城镇和乡村有25座教堂、6座小堂[96]，则共有33座，其中当有部分教堂建于1664年之后，故可推1665年时，松江地区（含上海）教堂总数为92座是可信的。

7. 常熟：《不得已》有常熟堂，《各处堂志》称常熟堂"在南门内"。伽马表列常熟堂2，教友1万；徐表列常熟堂2，教友10900人。常熟开教在1635年间，毕方济在常熟授洗300人，并建有住院和教堂[97]。1658-1659年间，教堂毁于大火。后又购置一新宅作教堂，但确切时间不明。另一堂则是1647年建的圣母堂。这是常熟城内的两座教堂。据卫匡国的资料："常熟城内有两座教堂，其他分布

于乡村”[98]。据另一份 1680 年的统计资料：“常熟城有两座教堂，附近的乡村有 14 座教堂和小堂”[99]。可知，常熟地区除城内两座教堂外，附近乡村还有一些教堂，但由于上引资料稍晚，故无法确定 1664 年时常熟乡村教堂数。

8. 苏州：《不得已》有苏州堂，《各处堂志》称苏州堂“在娄门内混堂巷，今移在皇府基河西”。伽马表列苏州堂 1，教友 500 人；徐表无堂数，列教友 500 人。苏州开教始于明末，1652 年何大化在苏州授洗 2359 人[100]，但未见建教堂。据费书《潘国光传》，苏州教堂建于 1658 年[101]，高华士博士亦称：“直到 1658 年，由于许甘第大的帮助，刘迪我以圣母的名义建起了一座教堂”[102]。可知，当时苏州 1664 年有教堂 1 座，教友至少 2359 人。

9. 嘉定：《不得已》有嘉定堂，《各处堂志》称嘉定堂“在东门内”。伽马表列嘉定堂 1，教友 200 人；徐表无嘉定堂数，列教友 400 人。嘉定开教始于 1621 年前，1622 年罗如望建嘉定教堂。嘉定为孙元化之故乡，孙元化去世后，嘉定教务渐衰[103]。清兵南下，嘉定遭兵祸，教堂当不保。后何时复建，不确。伽马表又列 Kiu Ting 一地，无教堂数，教友数 400，当即为嘉定之复录。

10. 太仓：《不得已》无太仓堂，《各处堂志》称太仓堂“在东门内太平桥”。伽马表无太仓名；徐表称太仓有教堂、教友。高华士博士公布的资料：“1662 年到 1665 年间，鲁日满在此（太仓）修建了一座新教堂，代替了位置偏狭的旧堂”[104]。费书《鲁日满传》亦称，鲁日满 1662 年建太仓教堂[105]。则太仓有新旧两堂，1669 年的资料称太仓教友数很少，但无具体数。

11. 昆山：《不得已》及伽马表均无昆山堂，《各处堂志》有昆山堂；徐表称昆山有教堂、教徒。费书《鲁日满传》：“（1662）昆山教徒信教虔笃，共积资建筑教堂一所”[106]。高华士博士亦称：“杨光先反教前，那里（昆山）已建起了一座新教堂”[107]。但无教友数。

12. 崇明：《不得已》及伽马表均无崇明堂，《各处堂志》称崇明堂“在城内东门里”。徐表称崇明有教堂及教徒。崇明开教始于 1639 年，费书《潘国光传》：“1639 年，国光应名医徐启元之请，首至崇明，为启元家属诸亲友授洗，是为崇明岛诸教区之始基”[108]。1662 年，鲁日满传教崇明，受洗者 200 人[109]。但崇明教堂建于何时不明。崇明有堂 1，教友 200 人。

十三、广西省：1664 年有教堂 1 所

1. 桂林：徐表、伽马表及《各处堂志》均无桂林名。《不得已》有桂林堂。荣振华称 1646 年瞿安德独自一人入桂林[110]。费书《瞿安德传》又称：“在桂林建教堂一所”[111]。知桂林有教堂 1 所，教友数不详。

2. 南宁：诸书表均无南宁名。荣振华书称，1648 年 3 月或 4 月间，瞿安德“在南宁为明王朝的公主们及永历的儿子们‘康斯坦丁’举行洗礼”[112]。费书《瞿安德传》：“诸后妃经安德、天寿劝化后，遂在 1647 年（伯希和考证为 1648）四月于永历及全宫人在场时受洗，受礼者 5 人”[113]。南宁有西教士传教，但未见建教堂。

十四、广东省：1664 年时有教堂 14 所，教友 3000 人

1. 广州：徐表与伽马表均无广州名，《不得已》有广州堂；《各处堂志》称广州堂“在西门外太平桥”。广州开教建堂始于 1581 年，但后放弃。直到 1646 年，“（毕）方济赖（庞）天寿之助，在广州建筑教堂居宅各一所，在鞑靼未取广州前落成。”[114]1651 年清兵第二次攻进广州后，此教堂未罹兵祸，“1651 年 12 月，鞑靼重取广州，（曾）德昭避居教堂……其后数年居广州，颇受主将孔王之优遇”[115]。此教堂一直到 1664 年仍存在。教友数不详。据费书《陆安德传》及荣振华提供的资料，1659 年 3 月陆安德在广州修建了一所教堂和一个住院[116]。则到 1664 年时，广州应有 2 所教堂。

2. 佛山：诸书表均无佛山之名。费书《陆安德传》：“（1659）在佛山……建置……教堂一所”[117]。是知 1664 年前佛山有一教堂。

3. 清远：诸书表均无清远之名。费书《陆安德传》：“（1659）在清远建教堂一所”[118]。

4. 潮州（原作韶州）：诸书表均无潮州名。费书《陆安德传》：“潮州（原译作韶州）为全省军队屯驻防御海寇之地，兵卒渔夫，颇有信教者”。又称“（1659）潮州有……教堂一

所”[11]。

5. 海南：诸书表均无海南名。海南开教在1632年。[12]到1636年时，林本笃在琼山、Jing-hoang（定安）、Pankao（仙沟）、Long-mo（龙门）四地设立四个教区，至1637年时，有教友665人。到1656年时有教友2253人[12]（一说3000人[12]）。到1664年前，海南岛有教堂2所，小堂7所。两堂应指定安县教堂及琼山县城北官街之教堂。七小堂应含琼山陈氏宗祠小堂、城中心小堂、琼山至海口坟场处小堂、龙门小堂、仙沟小堂、定城小堂及临高小堂[12]。

以上14省区共有教堂310所，教友169990人。以上为在文献中确有数据可查者，因有诸城镇乡村及山岭之中的教堂数（包括小堂）无法统计，再加上很多教堂均无具体教友数，因此，上述总计数据仍是全国教堂教友数的一部分，缺漏很多。以萧若瑟神父的估计数，“至康熙初年，各省教友不下二十万”[12]。而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1671年统计1664年这一时期耶稣会就有“教堂159座，教友248180人”[12]。毕嘉在1667年广州统计1664年全国教堂为159座，教友数为“246000人”[12]。两者统计数大致相近。1664年全国159座教堂这一数应指大教堂，而我上面统计310所教堂则包括一半以上的小教堂。以上全部是耶稣会1664年在全国所建教堂和受洗信徒之数据，应是大小教堂310所，教友248180人。

另外还有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顺治时期在国内发展的教堂、教友数尚未列入。方济各会1649年即有会士进入福建，但到1650年时转入内地，并进北京，在汤若望的劝说下主要在山东传教。[12]据康熙四年三月十四日清档称：

“栗安党供称，我于崇祯七年独自从西洋来广州香山澳，顺治十六年来山东济南购房建堂居住……我传天主教是属实。”[12]

栗安党，西名Antonio de Caballero，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可知，顺治十六年（1659）方济各会即在济南开教建堂。方济各会山东开教后，原福建之教堂均已放弃，教士或来山东，或返马尼拉。又据聂仲迁《中国历史》称，1660年，汪儒望与方济各会神甫利安当同管山东全省教务。[12]殷铎泽1671年统计中国教务时称，1660年时，方济各会有2人居中国，在山东建有3小堂，教友3500人。[13]则方济各会教堂3所，教友3500人。而据郎汝略《山东开教史》记载，方济各会在1662年前建教堂为4处，即济南、蒲台、博兴及泰安（原为耶稣会堂），教友3000人，到1665年教难爆发前，增加到5000人[13]。多明我会亦有一批会士于1653年进入澳门，1655年进入内地。费书《汪儒望传》：

“科罗拉多（Dominique Coronardo）神父入多明我会……1655年至中国，传教福建、浙江、山东三省，颇有成绩。”[13]

科罗拉多，即清译之郭多敏，多敏即Dominique前半部，郭姓即取Coronardo之Co；据前引康熙四年三月十四日清档称：

“郭多敏供称，我于顺治十年独自从西洋来至香山澳，康熙三年来至山东济宁租房居住，并无建堂结伙，……我传布天主教者属实。”[13]

前引聂仲迁《中国历史》称1660年时，汪儒望、利安当与科罗拉多“同管全省（山东）教务……如有赴外巡视教区者，必留一人居济南”。[13]可知，多明我会在山东济南、济宁均有传教，前面郭多敏称“并无建堂结伙”，恐怕是指没有建筑教堂，但不排除购置房舍设礼拜小堂。又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清档记载，浙江省送洪度贞、闵明我、费里伯、巴道明四人进京。[13]其中闵明我、费里伯、巴道明均为多明我会士，[13]可证多明我会1664年前有教士在浙江传教。再据1671年殷铎泽统计1664年全国教务情况称，到1664年时，多明我会在全国有“小圣堂21、会口21”及教友3500人，教堂主要分布在山东济宁，浙江金华、兰溪及福建福安、穆洋、顶头等地。[13]两会大小教堂数为教堂46座，教友7000人。再与耶稣会数据相加，则到1664年前，全国天主教总教堂数为356座，教友255180人。

---

①《辩学》（手抄本）附《各处堂志》，方豪藏本。转引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975-977页。岳麓

书社，1987 年。以下简称《各处堂志》，不另出注。
②(清) 杨光先《不得已》卷上《请诛邪教状》及《与许青屿侍御书》第 6 页及第 13 页，黄山书社陈占山校注本，2000 年。以下简称《不得已》，不另出注。
③(葡) 伽马 (Louis de Gama)《1663 年中国教务统计表》，载 (法) 樊国阴 (Octave Feneux)《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四章《中国教务情形》第 108 - 109 页，台北华明书局，吴宗文译本，1977 年。以下简称“伽马表”，不再出注。又据 (比) 钟明旦 (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Brill, 2001) 第 385 页引伽马之《1663 年中国教务统计表》，全国教友人数为 110100 人，与樊国阴所见不同。
④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八章《1664 年全国教务情形》第 239 - 241 页，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 年。以下简称“徐表”，不另出注。(法) 荣振华 (Joseph Dehergne) 著，耿寨译《在华耶酥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二章页 853 - 862《明末 (1664) 中国基督徒分布图》(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记录了 1644 年全国各地住院、教堂的数据，其中有许多处教堂并不见于伽马与徐宗泽的统计数中。这些 1644 年后未见著录的教堂当在 1644 年后被毁坏或废弃。
⑤(法) 费赖之 (Loui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八〇《利类思传》第 237 - 242 页，中华书局，1995 年。
⑥⑦⑨⑩⑪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八八《安文思传》第 257 页。
⑧⑫⑭⑮同上书上册九六《汪儒望传》第 285 页。
⑬同上书上册八七《李方西传》第 254 页。
⑯⑲㉔同上书上册七〇《金弥格传》第 215 页。
⑰⑱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兼论西学、西教的传播网络》，提交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等单位举办“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研讨会”论文，1996 年。
⑳(德) 魏特 (Alfons Vate)《汤若望传》第一册第 256 页，商务印书馆，1949 年。
㉑⑬康熙四年三月十四日《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覆审讯栗安党等五名西洋人传教案本》，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暨南大学古籍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 49 - 50 页，人民出版社，1999 年。
㉒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二六《高一志传》第 93 页。
㉓同上书上册八四《万密克传》第 251 页。
㉕㉖㊲同上书上册一二六《恩理格传》第 361 页。
㉗前揭《汤若望传》第一册第 108 页。
㉘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四五《傅泛际传》第 157 页。
㉙同上书上册六五《方德望传》第 209 页。
㉚㉞㉟同上书上册八七《李方西传》第 254 - 255 页。
㉛㊳同上书上册八〇《利类思传》第 237 页。
㉜㊵㊹㊷同上书上册一〇七《穆格我传》第 305 页。
㊱同上书上册四七《费乐德传》第 164 页。
㊴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许缵曾传》，第 73 页，中华书局，1987 年。
㊸㊺㊻⑩同上书上册七八《何大化传》第 227 - 228 页。
㊹㊺同上书上册一零八《穆迪我传》第 307 页。
㊻同上书上册二一《费奇规传》第 83 页。
㊼㊾㊿㉟⑱同上书上册一零二《刘迪我传》第 294 - 295 页。
㊽同上书上册一二零《殷铎泽传》第 327 页。
51同上书上册一零四《聂仲迁传》第 301 页。
52 66同上书上册三九《艾儒略传》第 135 - 136 页。
53崇祯十四年《建宁县正堂告示》，载钟明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五册第 2394 - 2396 页。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 年。
54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自崇祯末至永历末》第 259 页。河北献县天主堂，1931 年。
55 56 57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七八《何大化》第 227 - 228 页。
58同上书上册六四《聂伯多传》第 207 页。
59 60 61 62 63 64同上书上册七五《郭纳爵传》第 225 页。
66同上书上册三九《艾儒略传》第 135 - 136 页。
67 70夏瑰琦《明末天主教杭州开教与活动考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 年第三期。
68 71 73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九零《卫匡国传》第 261 - 263 页。
69钞本《辩学》，转引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卫匡国传》第 117 页。
72同上书上册一零一《洪度贞传》第 291 页。
74 80 83 97 ⑪同上书上册四零《毕方济传》第 144 - 145 页。
75 (荷) 约翰·尼霍夫 (Johan Nieuhof)《荷使初访中国记》，载 (荷) 包乐史 (Leonard Blussé)《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第 69 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年。
76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四二《史惟贞传》第 153 页。
77 85同上书上册九四《张玛诺传》第 281 - 282 页。
79同上书上册一一四《柏应理传》第 312 页。
81 82同上书上册一一八《毕嘉传》第 322 页。
84前揭《汤若望传》第一册第 257 页。
86 ⑩⑫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十一章

《中国圣教掌故拾零》第 307 - 311 页。

(87)（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一零《居要》第二，丛书集成本。

(88)（法）高龙磐（Colombel）《江南传教史》（法文本）第一册第 336 页。转引阮仁泽主编《上海宗教史》第十五章第 61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89)(95)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一章第 83 页，中华书局，1995 年。

(90)⑩⑩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七九《潘国光传》第 230 - 232 页。

(91)（比）高华士（Noël Golvers）《常熟耶稣会士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S. J., Missionary in Ch'ang - shu）第一章第五节第 256 页，鲁汶大学，1999 年，原书为英文，由作者研究生赵殿红译出。

(92)(94)（法）巴笃里（Daniello Bartoli）《中国耶稣会史》及（比）柏应理《一位中国奉教太太》，转引《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七九《潘国光传》第 231 页。

(93)前揭《常熟耶稣会士鲁日满》第一章第五节第 258 - 259 页。

(96)(98)前揭《常熟耶稣会士鲁日满》第一章第五节第 259 页。

(99)同上书第一章第一节第 243 页。

⑳同上书第二节第 249 页。

㊵同上书第四节第 255 页。

⑩⑩⑩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一三二《鲁日满传》第 337 页。

⑩前揭《常熟耶稣会士鲁日满》第一章第三节第 253 页。

⑪㉑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一章第 337 页。

⑪㉛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九二《瞿安德传》第 271 页。

㉛同上书上册四一《曾德昭传》第 230 - 232 页。

⑪同上书上册一二一《陆安德传》第 334 页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一章第 389 页。

⑪⑪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一二一《陆安德传》第 334 页。

⑪同上，原文译作韶州，因文称“为全省军队屯驻防御海寇之地”，韶州在粤北，不靠海，当为潮州之误译。

⑫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六八《林本笃传》第 212 - 213 页。

㉒同上书上册一零一《利玛弟传》第 289 页。

㉜同上书上册一二三《瞿安德传》第 340 页；参阅（日）小田叶淳《海南岛史》第 315 - 317 页，学海出版社，1979 年及韦经照《基督教在海南岛的传播》，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

㊷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自崇祯末至永历末》第 267 页。

⑫⑬（意）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1581 - 1669 中国教会状况概述》，1672 年刊本。转引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一章第 35 - 36 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年。

⑫（德）德礼贤（Paschal de Elia）《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 67 页，商务印书馆译本，1939 年。

⑫前揭《汤若望传》第二册第 332 - 333 页。

⑫（法）聂仲迁（Adrien Greslon）《中国历史》，转引自《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九六《汪儒望传》第 286 页。

⑬（德）郎汝略（Vitalis Lange）著，赵庆源译《山东开教史》，载台北《恒毅》总 281 期，24 卷 5 期，1974 年 12 月。而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十二章第 974 页引同一份殷铎泽的报告称，方济各会 1633 - 1660 年间共有教堂 13 所，教士驻所 11 处。这 13 间教堂当包括方济各会早期在广东、广西、澳门、福建、浙江等地所建教堂，但山东以外之教堂到顺治时均未保存下来。

㉝㊸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九六《汪儒望传》第 286 页。

⑬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拟将栗安党等 25 名传教士送回广东安插本》，载前揭《明清时期澳门历史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 59 页。

⑬（比）鲁日满《鞑靼中国史》之《序言》，转自《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四九《汤若望传》第 180 页。该书送北京传教士名单中有 4 名多明我会士，其中科罗拉多即西班牙传教士郭多敏（郭氏于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前去世，故 25 人不含郭氏），纳瓦莱特（Dominique Navarrete）即西班牙教士闵明我；萨尔帕特里（Dominique Marie Sarpetri）即意大利教士巴道明；略纳尔多（Philippe Leonardo）即西班牙教士费里伯。

⑬前揭殷铎泽《1581 - 1669 中国教会状况概述》，转引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一章第 35 - 36 页。又据卡明斯（J. S. Cummins）A Question of Rites,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Scolar Press, 1993）第 142 页页下注：1664 - 1665 年间，多明我会在中国有 20 间教堂及许多乡村小堂，较殷铎泽统计数少一间教堂。